



▲夹溪草堂左侧的郑樵雕塑。郑樵(1104年~1162年),字渔仲,自号溪西遗民,兴化军莆田县(今福建莆田)人,学者称“夹溪先生”,宋代史学家、校雠学家。(来源:莆田学院图书馆)

# 郑樵: 三年孤笔撰五百万字《通志》



《通志》三山郡庠刻本明万历递修本。(来源:莆田学院图书馆)

他不是朝廷史官,并非师承名家,没有官方藏书支持,仅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,凭一己之力编出了五百万字的《通志》。而这部著作作为中国历史上继《史记》之后又一部规模宏伟的纪传体通史巨制。他就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、校雠学家,被学者称为“夹溪先生”的郑樵。

## 儒门世家诞奇才,三年孤笔撰《通志》

宋代莆田科教鼎盛、文教发达,是“比屋业儒,俊造如林”的文化之邦,有着“地不大于曹滕,俗已几于邹鲁”的美誉,留下“一家九刺史”“一门五学士”等许多科举佳话。据《郑氏族谱》记载,郑樵的曾祖郑子堂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太学生;祖父郑宰是宋神宗熙宁三年(1070年)进士,父亲郑国器亦为宋徽宗政和年间(1111年~1118年)的太学生。

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家学渊源,使得郑樵自幼便聪颖好学、刻苦勤勉。《福建兴化县志·儒林传》称他:性资异人,能言便欲读书,为儿时已有脱流俗志。

1119年,郑樵的父亲郑国器“歿于姑苏”,他“徒步护丧归葬”。从此谢绝人事,放弃科举,在越王山其父墓地之南搭建茅屋,一边守孝护墓,一边勤勉读书,立下毕生治学著述的志向。

守孝期满后,郑樵与从兄郑厚从越王山迁往夹溪山,结草屋三间,相互切磋学问。

夹溪山中,郑樵“寒月一窗,残灯一席,讽通达旦,而喉舌不罢劳,才不读,便觉舌本倔强。或掩卷推灯就席,杜目而坐,耳不属,口不诵,而心通。人或呼之再三,莫觉。”

因家贫少有藏书,酷爱读书的郑樵只能“周游所至,遇有藏书家,必留借读尽乃去。”

南宋时期,虽朝廷政局动荡,然福建未遭兵火,莆田文化兴盛,藏书之家众多,全国闻名。于是,郑樵“搜尽东南遗书,搜尽古今图谱,又尽上代之鼎彝与四海之铭碣”,时人赞曰:惟有莆田郑夹溪,读尽天下八分书。

1135年,郑樵从夹溪山移至芑林山,在芑林寺附近另筑修史堂作为读书、论道、住宿之所,郑樵与从兄郑厚在此著述、讲学,声望日高,“一时名人若李纲、赵鼎、张浚辈咸器重之”。

在此期间,郑樵接连遭受重大的家庭变故,胞弟郑樵、子郑惕和妻子陈氏先后病逝。然而,纵使悲痛交集、贫病交加,依然动摇不了他著书修志的决心与梦想,以惊人的毅力,愈发勤奋刻苦、专心致志,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倾注在学习、研究和著述中。

1148年,为不使自己的著作湮没失传,郑樵积极响应朝廷号召,将自己30年来的治学成果进行全面整理,从编好的数百卷著作中挑选18部140卷,徒步两千余里到临安(今浙江杭州)献给朝廷,并呈上简述自己身世及抱负的《献皇帝书》,颇获高宗赵构赞许,把他所献之书“诏藏秘府(即国家图书馆)”。

1158年,经工部侍郎兼侍讲王纶等人的推荐,得到高宗赵构的召见。他面奏高宗:欲“取历代之籍,始自三皇,终于五季,通为一书,名曰通志”。高宗甚喜,叹惜“何相见之晚”,授予郑樵从九品右迪功郎,主管礼、兵二部架

阁库(古代档案库)。不久,由于遭到御史叶叶问的弹劾,郑樵以潭州南岳庙监官的身份回夹溪山编著《通志》。

于是郑樵在高山耸立、人迹罕至的夹溪山中新建一座草堂,隔绝一切烦扰,专心致志地修史,通宵达旦、笔耕不辍。

夹溪草堂现有两座房屋,西面靠近占星台有一座平房,原为郑樵“覆茅以居”的三间草房,宋乾道年间兴化军太守钟离松改为瓦房,现改建为“郑樵纪念馆”。

北面是一座石构殿堂,分为上下厅左右厢房。这里山清水秀,林密泉幽,鸟语花香,风光旖旎,被称为“胜迹殿”“无尘山房”。

夹溪草堂西侧有占星台,为郑樵夜间观星宿,研究天文之处。占星台下有洗砚池,上池外方内八角,下池外方内圆。

1161年,郑樵完成《通志》的编修工作,实现了会通众史、“集天下之书为一书”的夙愿。

## 会通古今纳百家,别出心裁成一格

郑樵凭借惊人的毅力和不懈追求,经历了十年访求图书、三十年著书的艰苦历程,四十年如一日,发奋攻读,笔耕不辍。

他以毕生的心血精力,凭一己之力编出了五百余万言的《通志》。

清代史学家、思想家、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评价《通志》:

郑氏《通志》,卓识名理,独见别裁,古人不能任其先声,后代不能出其规范。虽事实无殊旧录,而辨名正物,诸子之意寓于史裁,终为不朽之业矣。

鲁迅面对《通志》,更是发出“渔仲(郑樵)、亭林(顾炎武)二公,今人无人能及”的感慨。

《通志》有《帝纪》18卷;《后妃传》2卷;《年谱》4卷,以年表的形式,记载自三皇至隋的历代大事记;《略》52卷,分门别类记述氏族礼乐、天文地理、语言文字、校雠文献的典章制度;《世家宗室》11卷,记载春秋诸侯列国,及自汉至隋宗室的制度;《列传》105卷,记载历代重要人物1829人的事迹;《载记》8卷,记载南北割据、少数民族政权及近邻国家的情况。全书凡两百卷,五百多万字,堪为一部汇集天下之书、会通百家之学的鸿篇巨制。

《通志》中的《二十略》是全书的精华所在,为《氏族略》《六书略》《七音略》《天文略》《地理略》《都邑略》《礼略》《谥略》《器服略》《乐略》《职官略》《选举略》《刑法略》《食货略》《艺文略》《校雠略》《图谱略》《金石略》《灾祥略》《昆虫草木略》。

其中,又以氏族、六书、七音、艺文、校雠、图谱、金石等七略最具学术价值。

这七略是以往史志中从未有过的篇目,在史学的体例上具有开创意义。如《艺文略》,打破了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的四部分类法,创立了崭新的书目分类法。

《通志·二十略》集中反映了郑樵的史学见解和求实创新的学术观点,体现了一位博通百科的史学大家的睿智,凝聚了他毕生的学术探索精神。

《通志》以“会通”为主旨,以批判为武器,以实学为取向,以类例为方法,创新体例,而自成一言之言,具有鲜明的特色。

郑樵在《通志》中提倡治史要坚持“会通”,即“天下之理,不可以不会;古今之道,不可以不通。会通之义,大矣哉”。

“会”指会聚文献,广收资料,详尽占有史料。“通”则是对史料进行处理,正确认识,了解其发生、发展规律,掌握制度演变轨迹,探索其内在本质。

正是在“会通”思想的作用下,郑樵在修史与撰述等方面都尽可能地追求广博与通达,将古今道理与天下学问都融合在他的“会通”思想学说之中,真正做到了承前启后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。

## 疑古惑经勇批判,严谨治学垂千古

《通志》不仅反映了郑樵“会通”的史学思想,同时也开创了许多先例。

郑樵终生读书著书,但并不唯书是信。他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,正如他在《诗辨妄》中所言:

《诗》《书》可信,而不必字字可信。

他认为“求之经传”,容易“辗转生讹”,表现出其对古代经典和注释所持的极其客观审慎的态度。

他把耀人耳目、歌功颂德的词章之学斥为“语言之末,非实学也”;把部分史书中将自然灾害附会国家兴亡的五行之说斥为“欺天之学”“妖学”,指出:“仲尼既没,先儒驾以妖枉之说而欺后世,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。有两种学:一种枉学,务以欺人;一种妖学,务以欺天。”

他爱读书广读书,但骨子里,从不完全相信书本。他不仅从书中汲取知识和智慧,也提出质疑与批判,并发出尊重科学、破除迷信、解放思想的号召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郑樵的史学批判精神,对以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思潮影响深远,顾颉刚首次提出郑樵是一位富有科学精神的大学问家的见解。

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《中国科技史》一书中,多次提到郑樵及其《通志》,认为《通志》中含有大量的科学内容,肯定了《通志》的科学思想性,并认为郑樵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一位史学家。

郑樵注重将读书与生活联系起来,积极探析读书治学之道。他认为无论求知还是治学,死守书本是绝对行不通的。

他注重实践,到野外观察动植物的特点情性,游历名山大川来丰富地理知识,通过向农民学习丰富自然科学知识、获得实践经验,以求得“实学”。

他主张要利用实物,来印证书本知识。他的这种治学思想和方法,在当时尤为难能可贵。

近代史学家梁启超赞誉郑樵:宋郑樵生左(左丘明)、马(司马迁)千岁之后,奋高掌,迈远蹠,以作《通志》,可谓豪杰之士也,其《自序》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,语语皆中窍要……史界之有樵,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……

郑樵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。当他籍籍无名、穷困潦倒的时候,已经具有“数陈古学,自成一言”的志向;当他书藏秘府、名满天下的时候,辞官不受,愈加专注著书。

纵然一千多年过去,郑樵和他的《通志》依旧熠熠生辉,其刻苦钻研、锲而不舍、持之以恒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,勤勉奋斗、一往无前。

(陈颖兴 来源:学习强国“福建学习平台”)